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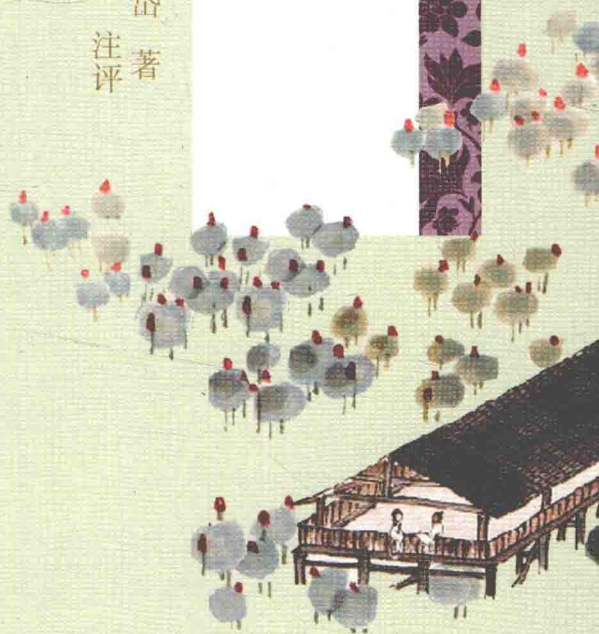


【第二辑】

国学经典丛书·名家注评本

西湖梦寻

(明)张岱 著
李小龙 注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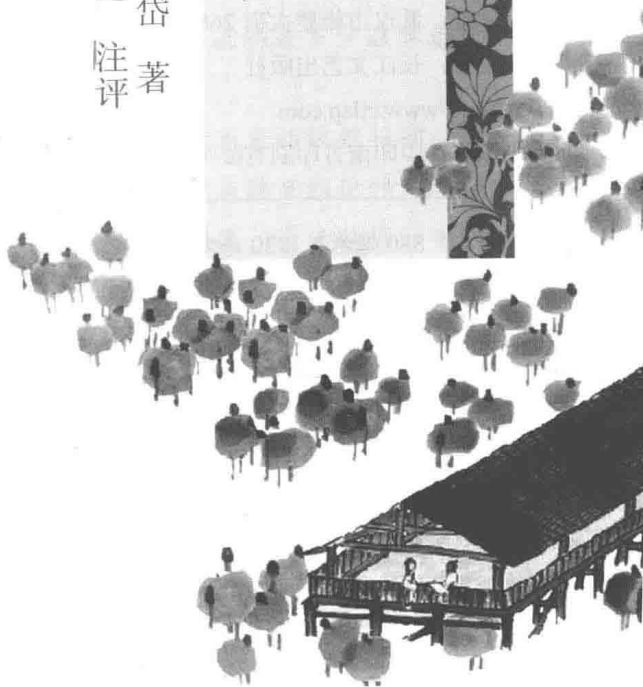


长江
文艺出版社

西湖梦寻

(明)张岱 著
李小龙 注评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湖梦寻 / (明) 张岱著; 李小龙注评.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6
(国学经典丛书. 第二辑)
ISBN 978-7-5702-0422-9

I. ①西…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小品文—作品
集—中国—明代②《西湖梦寻》—注释 IV. ①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2152 号

策 划: 张远林

责任编辑: 黄海阔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校对: 毛 娟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4 页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78 千字

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学院院长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来说，缺乏的也许不是所谓的“革新力量”，而是“知旧”，也即对传统的了解。

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都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从先秦的《诗经》《易经》，晚周诸子，前四史与《资治通鉴》，骚体诗、汉乐府和辞赋，六朝骈文，直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在传统经典这条源远流长的巨川大河中，流淌着多少滋养着我们精神的养分和元气！

《说文解字》上说“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上说“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经与典交织运作，演绎中国文化的风貌，制约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生活秩序。中国文化的基调，总体上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当然也是指导人生的。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还是先民传唱的诗歌，屈原的忧患行吟，都洋溢着强烈的平民性格、人伦大爱、家国情怀、理想境界。尤其是四书五经，更是中国人的常经、常道。这些对当下中国人治国理政，建构健康

人格，铸造民族精魂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典是当代人增长生命智慧的源头活水！

长江文艺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及普及，近年来更在阐释传统经典、传承核心文化价值、建构文化认同的大纛下努力向中国古典文化的宝库掘进。他们欲推出《国学经典丛书》，殊为可喜。

怎么样推广这些传统文化经典呢？

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前言

晚明是小品文的时代，张岱则是晚明小品文当之无愧的殿军。他不但用自己的灵性进一步扩展了小品文的艺术疆界，而且用自己沉重的家国之痛让小品文的小性灵承载了更丰厚的内容。

一、张岱生平及著述

要了解张岱的生平与著述，我们也可以用他的一篇小品文为纲来梳理——他的名文：《自为墓志铭》。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变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他之所以自称“蜀人”，是因为其远祖为古剑州绵竹人，虽然中间多有迁徙，但他著仍多属“蜀”或“古剑”字样，以示不

忘本源之意。

张岱是真正的诗书世家，其远祖可追溯至唐代名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至南宋初又出现了“总中外之任”的重臣张浚。而其高祖张天复、曾祖张元忬、祖张汝霖均以科举起家而为显宦，其曾祖张元忬更为隆庆五年之状元，可谓盛极。所以张岱从小便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故其自评“少为纨绔子弟”，连举十二“好”，均为明清时代贵介公子之所尚。然而时代让他们这个虽已没落但尚留架子的大家族彻底败落，在张岱四十八岁时，明亡清立，中国历史又进入了改朝换代的关头，张家也从世家而变为赤贫，“十二好”公子亦成为“断炊”者。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帝而不谄，下陪卑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争利夺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搏菹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澁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年近七十的张岱在新王朝和新赤贫之下已经生活了二十年，他需要对一生进行总结，于是便有了“七不可解”的自评，这“七不可解”充满了复杂难名的情绪。如“贵贱紊”，自然有世代陵替之感，也无疑有对新朝的抵触；“贫富舛”则不但有上条之含义，更有自身操守的坚持；“文武错”一条则指其曾以布衣而上书请斩马士英并率兵追击之事；“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是苏轼的话，张岱无施不可之才确有苏轼之风，然其益之以“不谄”“不骄”，则更有超然之致，而“尊卑溷”之评显然是反语了；“宽猛背”与“缓急谬”均为个人修养的自得之语；“智愚杂”则从另一面显出文人之迂与精致来。这些或庄言或谑语、或自嘲或自矜的七不可解比任何陈述都鲜明地描述出张岱的性格来。于是，与前“十二好”相对，这里又有“八可”“八不成”，并且自虐式列出“六为”，亦激愤之语也。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匱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俚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

张岱一生蹭蹬，然亦玉成了他的立言事业，其著作极多，涉及极广，质量也很高。这些著作可以说涵盖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而最为其所重视的，自然是史学著作。张家自张元忬开始便被称为“史学世家”，张岱在忤逆不遇的明代就开始了史学的创作，甲申之变后，这种著述行为就具有了更深的意义。他的《石匱全书》（张岱先有《石匱书》二二一卷，又有续作六十三卷，后人题为《石匱书后集》，实不妥，据张岱之孙张礼为《西

湖梦寻》所作之凡例，当与《石匱书》合为《石匱全书》）共近三百卷，为有明一代史实之巨著，代表了明清之际明史修撰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石匱书》一直未能流通，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认为不存于世，故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

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藏生牛黄丸盈数簏，自余因地以至十有六岁，食尽之而厥疾始廖。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隼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此段概述生平，以此知其准确的生年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幼时聪慧，不仅当时大名士陈眉公（继儒）期其“以千秋之业”，其实作为山阴状元坊张氏之长孙，张岱自幼便是在这种期望下长大的，但历史已让这种重振家声的期望烟消云散了。而张岱却以其文字成就了另一番“千秋之业”。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圻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圻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圻。”伯鸾

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

生与死的选择是明清巨变下文人普遍的困境，不能觅死，不能聊生，迁延不决，就仍存人世。此年张岱已年登七十，依《淮南子》的提法亦算中寿了，故欲仿古人自为墓志铭。有趣的是，所仿效者有徐渭，而据其《琅嬛诗集序》载“余老友吴系曾梦文长说余是其身后”，而张岱早年亦极喜徐渭之诗，且曾搜集《徐文长逸稿》，仿徐渭自为墓志铭，确得其宜。

二、张岱卒年讨论

不过，前引张岱《自为墓志铭》只能截止至其写作之时，时年七十，自然无法载录其卒年与寿数。因此，学界对张岱卒年意见颇不一致。胡益民先生据《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自序之末署“庚申八月明后学张岱敬书”以及《琯朗乞巧录》自序“庚申八月菊日八十四岁老人古剑张岱书于琅嬛福地”之语，断定其当卒于康熙十九年（1680），享年八十四岁。其实，这些材料只能说明张岱卒年不会早于此年，但并不能确定。不过，在无确切资料之时，此推断似亦合情理，笔者在此前校注《西湖梦寻》及点校《夜航船》时也采用了这一说法。

但是清人温睿临《南疆逸史》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材料。温睿临是浙江人，温体仁族孙，对浙江文献非常熟悉，而且，其与当时史学大家万斯同交好，此书亦因万氏建议而撰，温氏《南疆逸史·凡例》中详细说明了其与万氏就此书之对话，并细列了他所看到的晚明史料，同时，他“乃取万子季野明末诸传及徐阁学，合而订之，正其纰缪，删其繁芜，补其所缺，撰其未备，以



成是编”，可信度很高。而其在卷三十九《张岱传》中明确称其“年八十八卒”（《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页），若无确证，自不可忽视此证。

201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路伟先生自天一阁新发现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其书为朱鄮卿先生所捐之别宥斋藏品，书前有“朱别宥收藏记”朱文长方印，这与张岱所编《夜航船》一书颇类——后者从未刊行，仅凭天一阁所藏朱氏别宥斋藏钞本存世，以此亦可知此《琅嬛文集》之可靠。此新发现之钞本包含大量此前张岱文集所未收之作品（据粗略统计，有诗近五百首，文二十余篇）。其书责编陈小林先生指出，“沈钞本所收七律是编年的，最后一首为《癸亥除夕》，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张岱时年八十七岁。”诗云“老景蹉跎逐日挨，桃符又换一年牌。文辞贾岛无烦祭，穷狎昌黎不算灾。志短懒添商陆火，囊羞应办辟瘟杯。里中痰市无賒账，反免他求避债台。”（《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则从诗作内容来看，确当为其晚年所作。只是此前所推云“张岱时年八十七岁”稍有疏忽，因为其诗名为“癸亥除夕”，确当作于康熙二十二年，换算为公元纪年却不在1683，确切地说，应该是1684年2月14日，可知，写此诗时张岱已然八十八岁。当然，就古人而言此时还不到八十八岁，但张岱除夕写了诗，一般来说自然会进入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古人所认可的八十八岁了。

其实，即便没有新材料，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张岱诗文集》中有《万休师修大善塔》一诗，诗中有云“若吾大善力既绵，相传天监千余年”，另一篇《修大善塔碑》则更清楚地说：“肇惟天监初成，正值梁武帝舍身之日；后经永乐再造，适当建文逊国之时。岁月迁延，已至千一百八十年于此……”（《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1、287页）据宋施宿

《(嘉泰)会稽志》卷七云：“大善寺在府东一里二百一十步。梁天监三年，民黄元宝舍地，钱氏女未嫁而死，遗言以奁中资建寺。僧澄贯主其役，未期年而成，赐名大善。屋栋有题字云：‘天监三年，岁次甲申，十二月庚子朔八日丁未。’”则其寺建于天监三年(504)，加“千一百八十年”，正为公元1684年。只要作为史学家的张岱计算年历时不出重大差错，此诗与文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则或当据温睿临之记载定“年八十八卒”。

三、本书的整理情况

《西湖梦寻》之自序写于康熙十年(1671)，序中已有“作梦寻七十二则”之语，故此时自己成书。然其付梓问世却已在四十六年之后了。据其孙张礼为凤嬉堂刻本所作《凡例》云：

先王父生平素多撰述，所著如《陶庵文集》《石匱全书》以及《夜行船》《快园道古》诸本，皆探奇抉奥，成一家言。以卷帙繁多，未能授梓。是集为从弟濂携来岭南，而韶州太守胡公见而称赏，令付剞劂，以张前徽。余小子自顾颡愚，不克仰承先志，而奉兹遗集，益感中怀，爰之梓人，镌以问世。其家藏诸种，俟有力梓行。庶几先王父未坠之精华，复得表章于当代也已。

从其“卷帙繁多，未能授梓”“从弟濂携来岭南，而韶州太守胡公见而称赏，令付剞劂”等语看，此书之前从无刊本，此为初刻。而其署为“康熙丁酉年十月望日”，知已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了。幸运的是，此原刻本现在数本流传于世，一为黄裳

先生旧藏（参其《清代版刻一隅》及《前尘梦影新录》），一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尚有一部藏于公安部群众出版社。

此后光绪九年（1883）又有刊本，删除了康熙本之凡例，并因金堡诗文之被禁毁而调整了序之排列：原本首为金序，现改以王雨谦序，将金序置于第四，并隐金堡之名而为武林道隐，正文中凡涉及金堡者亦均改之。而丁丙辑刻《武林掌故丛编》，第六辑收入此书，亦为光绪九年所刊，与此本同。此后各本，大多出自《武林掌故丛编》。

此书近数十年坊间印行甚多，以情理推测，有康熙原刊本存世，坊间所印自当以原刻为据，从而更近张岱原本之真，然事实却未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于《明清笔记丛书》中收入马兴荣先生点校之《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之合刊本，《点校说明》中云“《西湖梦寻》有康熙本、光绪本等数种”，现以“光绪本《西湖梦寻》为底本，参校其他本子”。然经仔细对校发现，点校并未以康熙本参校，全书正文仅出校记六条：第一条是《明圣二湖》篇“在清明则萍聚之”句，校云“清，《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作‘晴’。”然此校有误，光绪本原文即为“晴”；而第二条《岳王坟》“万俟高”之“俟”、第三条《孤山》“庾岭”之“庾”字，原本实不误，不烦校改；第四条《关王庙》“忠臣义士”，据文意改为“忠臣义士”（康熙本即为“忠”）；第五条《于坟》“金屏梅”据《陶庵梦忆》改为“瓶”；第六条《宋大内》“两宫十里恨”据刘基原诗改“十”为“千”。六条均未涉及康熙本。中华书局2007年将此本收入《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均仍原本之旧（能看到的改动是为每则加了序号并在全书之末编制了《西湖梦寻》引诗作者索引，再就是删去了《点校说明》下的时间落款）。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家遂先生校注本，云：“《西湖梦寻》旧有《西湖集览》及《武林掌故丛编》本，又有杭州六艺书店及上海杂志公司重排铅印本，今以《西湖集览》本为底本，而以他本校之。”《西湖集览》本仍为丁丙所刻者，与《武林掌故丛编》本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程维荣先生校注本，云：“以《武林掌故丛编》本为底本，参校他本。”但以上二本之云“参校他本”实均未参考康熙本。

那么，康熙本文字究竟是否更近真呢，我们举出数例即可见。

《明圣二湖》录张岱《苏堤春晓》诗，第三句光绪本系统者均作“文弱不胜夜”，末字实不可解，程注本注云“疑为衣”，余本均无校，而康熙本原即“衣”。

《玛瑙寺》有“保六僧撞之”一句，上云三本均同，然“保”字不可解，孙注本释为“责成”，程注本则以“使，分派”注之，均为以意为注者。实原本为“供”。

同篇有“吾想法夜闻钟，起人道念”句，“法”字费解，程注本云“疑为‘清’”，而原本即“清”。

如此之例甚多，不再详举。

另有漏字者，如《灵隐寺》篇光绪本阙一行二十字：“见有千余人蜂拥而来，肩上（有布袋，贮米五斗，齐至仓前库头，掣数袋斛之，五百）担米，顷刻上禀，斗斛无声。”（括号中为所阙者。）康熙本与光绪本皆每行二十字者，故后正阙一行。

还有需考证方知正误者：

如《十锦塘》引李流芳文有“小春四日”句，光绪本或因此文有“壬子正月”之语而改为“小春四月”，实误。首先，四月实已非春；其次，小春实指十月，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七



引《初学记》：“冬月之阳，万物归之。以其温暖如春，故谓之小春，亦云小阳春。”康熙本即为“日”，且李流芳《檀园集》原文即为“日”。其实，《檀园集》还有旁证可参，其《程翁震泉贤配朱孺人七十寿序》文末有歌云：“阳月兮小春，设帨兮兹辰。月初生兮令方新，菊黄花兮枫丹林。”所谓“阳月”与“小春”同义，后所举之菊黄、枫丹皆为十月物候。

还有康熙本与光绪本皆错者，但可观其致误之脉络：

如《孤山》所附徐渭《孤山玩月》诗有“暇时吐高怀，四座尽倾听”一联。第一字康熙本为“夏”，光绪本为“暇”，看上去似以光绪本为是，然检核《徐渭集》方知其原为“忧”，康熙本误“忧”为“夏”，尚存形似，光绪本校刻者以此不通，亦不考文长原作，即意以同音而改为“暇”，看似通顺，文意却大变。

因此，本书以康熙刻本为底本，校以光绪本及所引袁宏道、李流芳、徐渭等人别集，力图整理出一个文字可信的本子来。不过，限于体例，不列校记。但有几项点校原则，说明如下：一、尽量不改动底本，若有明显误字者，据参校本改（仅意改两字，即序言所署时间，原为“辛亥七日”，“日”字必“月”之误，以其后尚有“既望”二字，故径改；《六贤祠》“立四贤祠，以祀李邕侯、白、苏、林三人”，改“三”为“四”。而前文所云“夏”改为“忧”是可以确证的误字，故径改）；二、尽量不据各家别集校改底本，因张岱在收录这些诗文之时或有自己的考虑，故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柳永《望海潮》词等均与原文有出入，再如刘基《宋大内》诗，中间少了八句，但上下仍贯通，或为作者有意落之，故均仍其旧；三、所引诗文之标题亦与原文多不同，亦不据各家文集回校；四、康熙本所附五篇序及凡例对理解《西湖梦寻》之成书很有帮助，故附录于书末。



以上的情况均是对文字校订的说明，还有就是本文的注。

《西湖梦寻》的注本其实并不少，若论认真而有贡献者，仍属孙家遂先生注本，孙先生事属草创，虽有阙注或误注者，但为此书注释椎轮大辂。此后程维荣先生注本当参考了孙注，但也有不少更正旧注之误者及新注，也是不错的本子。

不过，此二本亦有应注而未注或语焉不详者。

比如，全书提及人物中，有许多注云“待考”或失注者，本书就补注了八十余人。对人物生平的了解自然会帮助我们对文章内容的接受。比如《灵隐寺》篇提到的具和尚，张岱已说此人“为余族弟”，且送其之诗有“余自闻言请受记，阿难本是如来弟。与师同住五百年，挟取飞来复飞去”之句，可见张岱很尊敬此人，且此人于灵隐寺亦大有功德，《灵隐寺》一篇实为具和尚之专传，但孙、程二注均未及之。胡益民先生于张岱研究颇有心得，其《张岱评传》及《张岱研究》二书均考证此具和尚实为静涵禅师张有誉，算是对张岱交游有了新的开拓。然仍有误，此人实当为张岱族弟张弘礼，吴伟业有《灵隐具德和尚塔铭》一文，对此人生平有详细的叙述。再如《西溪》篇云：“余友江道闇有精舍在西溪，招余同隐。余以鹿鹿风尘，未能赴之，至今犹有遗恨。”江道闇孙、程二注本亦未注，此人实名江浩，字道庵，钱塘人，明诸生，明亡为僧，名济斐，字月用，其曾于西溪之横山筑蝶庵并隐居于此，张岱所云精舍，即江浩所建之蝶庵。而张岱晚年曾自号蝶庵，应有稍补其遗恨之意。这些人物若不注出，对原文的理解自会打折扣。

除此之外，有关典故及遗迹亦尽力搜讨，以期所注更为恰当。如《法相寺》开篇即云“法相寺俗称长耳相”，孙注本注云“疑为‘长耳寺’之误”，程注本则肯定地说“应为‘长耳寺’”，然据《咸淳临安志》《武林旧事》《西湖游览志》等书

载，知“长耳相”乃“长耳相院”之省称，《咸淳临安志》尚有“长耳相巷”之名；此外据《梦梁录》等书载，知此寺长耳和尚法真有号为“长耳相禅师”，故其并不误。再如《法相寺》又有“至宋乾祐四年正月六日，无疾，坐方丈，集徒众，沐浴，趺跏而逝”之语，《龙井》有“唐乾祐二年，居民募缘改造为报国看经院”之语，孙注本前者云“按宋无乾祐年号，必有误”，后者云“按唐无乾祐年号，此处必有误字”；而程注本前者则“疑为乾德之误”，后者直接云“当为乾封”。就后者而论，若为乾封，则在唐初，元人邓文原有《南山延恩衍庆寺藏经阁记》一文云：“寺肇始于吴越钱氏，曰报国看经院。”知与唐初已隔近三百年矣。至于前者，据《宋高僧传》对长耳和尚生平之记载可考知，此人实卒于后汉乾祐三年之次年，即后周广顺元年，故此所载“宋乾祐”实为“后汉乾祐”，而载述者以其乾祐三年十一月病，次年三月“趺跏而逝”便顺理成章地写为“乾祐四年”了。由上可知，这两处无论是唐还是宋，实均为“后汉”之误。

然而，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注书则更易为通家所笑。若本书校与注有疏误之处，还期方家赐教。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本书整理中的评点。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为独特的阅读与欣赏体制，可惜的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评点退缩成为文本可有可无的附件，以及佐证某些文学理论的材料，于是，除诗词的评点在当下的整理中还多有保留，以为解诗之助外，而说部与文章则几乎全部被剔除出去。这是完全把中国的小说与文等同于西方类似文体后的以西律中的结果。

因此，在整理《西湖梦寻》时，我试着把张岱友人王雨谦所作之评点完全保留下来（书中简称“王评”），这样，读者在阅